

明清小說新考



235/12

明清小说新考

欧阳健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南京7214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625印张 2插页 281千字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江苏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

ISBN 7—5059—0356—X/I·226 定价：7.70元

新华书店
PDG

目 录

序.....	张守谦 1
国貽室《施氏家簿谱》世系考索.....	8
《水浒》作者施耐庵诸说评考.....	15
《水浒》简本繁本递嬗过程新证.....	43
《京本忠义传》残页评价商兑.....	81
《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年代探考.....	100
——兼探罗贯中的生卒年及施罗关系	
《三国志》·《三国演义》·《赤壁之战》.....	121
《三遂平妖传》原本考辨.....	144
河阴知县吴承恩不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	171
〔附〕吴承恩材料的新发现	

《有夏志传》与《山海经》之双向探考·····	174
《樗机闲评》作者李清考·····	207
《樗机闲评》本事考证·····	226
南京图书馆藏旧钞本《金云翘传》看校札记·····	293
〔附〕贯华堂评论《金云翘传》回评（圣叹外书）	
《五色石》、《八洞天》非一人所撰辨·····	330
《隋唐演义》“缀集成帙”考·····	353
《野叟曝言》版本辨析·····	397
杜纲生平小考·····	418
附：《宋元小说话本集》前言·····	423
跋·····	431

序

张 守 谦

一种书有了不同的版本，就有了比较；有了比较，就有了考镜源流、论辨得失；讲究这些事情，就有了版本学。历来讲版本的书，也有讲考证、讲辨伪的，但从清同光直到民初，更多的是注重在版本形貌的描述：书若干卷，是否全帙，题署撰人，有无刻跋，行格字体，版面阔狭，何时何地何家刊刻，有无刻工姓名牌子印记等等，都要一一注明，以便区分其与同书的另一版本的异同。讲版本又多与藏书家有关联、与文物收藏有关联，所以也常注重版本鉴定之法，以识别究是原刻翻版，真货假货；讲宋元旧槧，孤本秘籍，传授源流，藏主变更，名士题跋，大老盖章等，诸如此类，甚至把“墨色光泽，纸张洁白，读之怡神悦目”也算上一条，有一位知名度很高的藏书家，以此作为他评订善本的标准之一，现在还有人在百般赞扬，虽然这和书的内容并不相干。总之，这些对形态特征的著录，都不出簿录的范围。这些著录是最基本的，是不可缺少的，不过，从版本学来说，我认为这种形态描述只是初级的层次。

五四以后，古典小说的考证热闹起来，开创了古典小说

版本研究的新局面。且只说几部大书：《三国演义》的版本情况比较清楚，毛宗岗所说的“俗本”和他据以批评的“古本”，自然是遮人耳目的话，郑振铎、孙楷第两位先生的几篇文章，已把《三国志平话》和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与毛宗岗以及毛以外的几种批评本的关系，基本上讲清楚了。《红楼梦》开始时，大家都在程伟元本上作文章，后来陆续发现了几种抄本，就和原来讨论的深度大不相同。现在台湾有人说程伟元活字本也不止甲本、乙本二种，还有丙本、丁本。是否可以这样认定，在《红楼梦》的讨论中，这丙本、丁本处在一种怎样的位置，现还在研究之中。《金瓶梅》词话本的发现使《金瓶梅》研究有了大的突破，但词话本演变成说散本这一过程的具体情况怎样从版本上来说明，说散本究竟刊于何时？明末还是清初？张竹坡评本前是否还有别人的评本（金圣叹、李渔和张评本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看起来好象解决了，仔细追问起来却又并没有完全解决，看来一时还不易都搞清楚。《水浒传》讨论原来是着重在七十回本上，胡适甚至曾经认为金圣叹确见过那样一种“古本”。后来百回本、百二十回本都出现了，他才发现所下结论过早。《水浒传》的版本最多，且有繁本、简本两个系统之别。完全弄清楚这些问题，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想法，恐怕还要再讨论一阵子。本书《〈水浒〉简本繁本递嬗过程新证》一文专论此事，引了《京本忠义传》残页、明嘉靖刻本、容与堂本三种本子中的文字作比较，又把各本相同部位的情节进行比对，以说明《水浒》繁本、简本的递嬗过程，是比较令人信服的。以上所说的这些研究，自然可以归之为

文学史、小说史的题目，但从小说版本学的角度来说，这些讨论都实实在在是谈的版本。这些讨论当然不可避免的要谈到版本的形貌，此外更要涉及到小说的内容，某些史实，人物形象，文字技巧，语言，以至作者的人生观、政治态度，艺术风格等很多方面，从版本学看，我认为这显然和初级层次的单纯描述版本形貌不同，是较高级的层次。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初级层次和高级层次，不是说他们谁优谁劣，而是说涉及的范围、深度有所不同。

版本研究能否有新的发现、新的突破，看起来除去依靠敏锐的观察力和有足够的专业知识、丰富的经验之外，材料是极重要的。比如说忽然发现一种前所未见，别人还不知道或没有引用过的版本，或是什么别的材料，就有可能作出新的判断。这种文章比较好作，只是这种机会却并不是人人皆有的。过去有人要保持“专家”地位，垄断资料，不肯把“秘本”拿出来公之于众，就是这个缘故。而用大家都已知道的旧材料作文章，从中发现能站得住脚的新意，大不容易。你能发现的问题，别人也能发现，这就看谁认识和理解得更为深入，这种讨论要使人信服，一要有扎扎实实的证据，凭主观猜想，凭想当然，别人是不肯投赞成票的；二要说得合情合理，符合逻辑关系。作好这两件事要凭硬功夫，要费时间，是很艰苦的劳动。本书内《〈三遂平妖传〉原本考辨》一篇，用很多证据证实《平妖传》四十回本在前，二十回本乃是删简四十回本而成，一反平常说的四十回本乃是冯梦龙增补发展二十回本而成的观点。也许所举证据还不够充分，但毕竟是在有一定根据的前提之下，开创了解释这两个

本子关系的新说，翻了半个多世纪来被判决的案。此文论据完全是从现有材料中挖出来的，从现存二十回、四十回两种版本的对比中寻找内证，就人物、情节、文句、诗词、回目、分卷各个方面举出了几十条例证，和上述《〈水浒〉简本繁本递嬗过程新证》那一篇一样，都是花了大力气，极见功力的。

附带说一句，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卷一，载有明万历王慎修刻“《三遂平妖传》四卷二十四回”一种，署“明罗本撰”。下有注云：“《平妖传》坊间通行本皆为明吴县冯梦龙增补，万历罗本极罕见。”此本杜氏未注明收藏之处，然隔二书之后注有“76”，此是杜氏书中上海图书馆的代号。此书是否藏上海，杜先生的注不大清楚。《三遂平妖传》四卷二十回本，国内从前只有马隅卿先生收藏一部，实为海内孤本，因此书极罕见，马先生名其书斋为“平妖堂”，以示珍爱。此书后归北京大学图书馆。《平妖传》二十回本是有名的本子，研究小说版本的人没有不知道的。杜氏著录的二十四回本较马氏藏本多四回，不见他处著录，也未听到过有人议论。这一个“四”字关系重大，可以使有些朋友失眠的。杜先生是精于版本的前辈，他不会弄错的（或者是印刷误植亦未可知）。欧阳先生大概也未听说过有这种本子，如果确有这么一个万历二十四回而且也是王慎修的刻本，他的文章大概要补充了。新材料有极关键的作用，我们也盼望搞著录的同行在这种关键字眼上千万当心，请校对同志着实校几遍，这种字眼可是疏忽不得。

本书中《〈隋唐演义〉“缀集成帙”考》一文，涉及到隋

唐系列各书的版本，《隋唐演义》的继承关系，“缀集成帙”的写作方法等三个大问题，有充足的论证，有细致的分析，有独创的结论。尤其是论证了《隋唐演义》未必直接取材于韩偓“三记”，中间还可能有“二道贩子”（褚人获能看到“三记”当不成问题），理清了《演义》缀集成帙的写作过程，这是以《演义》为例，说明讲史小说缀集成帙的事实。我以为，“缀集成帙”不仅是讲史小说的特点，也是中国通俗小说写作方法的特点（模式），只是讲史表现得更为突出，更容易找到典型就是了。历史故事，民间传说，说书讲唱，寓言神话，乃是中国通俗小说不可分之源泉，缀集成帙，顺理成章。这一传统，延续至近代，各类小说皆可见，非只讲史也。《金瓶》、《西游》、《封神》、《包公》、《济公》皆有缀集之事，只是所取他人之书或多或少（有称“留文”者），加工或粗糙（照抄）或雅致（改写），作者水平有高低，取材不同，自亦有异。此种写作方法在晚清小说中又大泛滥一时，《闽都别纪》是一本大杂烩，《九命奇冤》即《警富新书》的改写，欧阳钅源《负曝闲谈》整段整段抄《儿女英雄传》（孙楷第有讲《儿女英雄传》一文，讲文康亦用别人的材料），这些当时有名的作家并不脸红。因为故事来自民间，你写得，我也同样写得，因而这种“缀集”在习惯上是可以被接受的，至多评论时怨某些书的缀集水平太差，也就是了。缀集之佳者，应该是新书既出，旧本即被淘汰（如《警富新书》之类），可惜这是极少数，多数是才气不够，总弄得“天衣有缝”，令人发噱。戏法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不能因为有次品，就说这种方法全

是胡闹。当然，到了今天，就作为作者道德修养问题被强调了。

中国通俗小说写作方法可论者：（一）缀集成帙。（二）“有诗可证”。前者为提纲，后者为总结，佳作非常提神。（三）行文中介绍知识。解说难点使读者接近故事背景，又起抑扬顿挫的作用，利于行文。话本中此事甚多，大家欢迎。说老实话，我有些知识，就是由此学来的。（四）（五）……等等，可惜这些方法都被“五四”时斥为不符合“文学概论”，一律被抹杀了。通俗小说如果不是占了白话的光，承蒙胡适诸人错爱，险些也被一股脑儿扫入东洋大海。直到现在仍有论家怀疑研究通俗小说的价值，他们戴西方眼镜（有不少是势利牌的），看中国货不值钱。其实，要讲小说美学，恰恰最不能专听西方那一套。

欧阳先生的文章有分量，不只我举例的这几篇，这有他的成绩在，用不着我来给他吹嘘。我要说的只是他的研究成果从小说版本学的角度看，不是泛泛而谈的空头讲章，也不是故作玄虚，卖弄词藻，吓唬老百姓的新江湖滥调。从他每一篇文章都能见到他严肃认真，刻苦劳动的痕迹。他讲版本的这几篇，确是有深度、有创见的，很可以由此见到小说版本研究的趋向，即便这种研究也并非由他开始。我以为对这些文章的评价不能只局限在他所讨论的问题上，还应看到他的研究方法，他的追求意向，看到他对小说版本学的深化。即便现在进行这种研究的并非仅他一人，但他这本书带给我们的信息确实是很强烈的。他的研究使小说版本学的内容丰富了，使我们对版本学的这一高级层次看得更真切了。我想

这是我应该，也是我最高兴在这篇序文中要说的话。

我和欧阳先生相识，开始是在杂志上见到他的大著，觉得这位先生是很富有想象力的，我很佩服他的肯下真功夫和判断问题的胆识。他们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约我写几个条目，我很乐于从命。原来我收集过这样的材料，想独自编一部通俗小说书录，若干年来积存了一些卡片，只是在大家都经过的动乱以后，没有给我剩下多少。现在年老体衰，不能再跑到各处翻书了，而且我也终于认识到这样的工作其实是不可能靠一人一时之力完成得了的，我把当初拟的书录凡例寄他参考，并祝他们早日把提要编成。正因为小说版本研究上有共同语言，从此经常通信，本书所收的文章多数承他寄给我，我都认真读过，受益很多，所以我也是他的一个忠实读者。本书出版，他命我写一序言。作为同行和读者，我把我的“读后感”写在这里，但愿不要因为我的文字拙劣而减了本书的成色。

1987年6月于天津大图书馆

国贻堂《施氏家簿谱》世系考索

近年来，由于大丰县许多同志的努力，征集到多项有关施耐庵的史料文物，有助于对施耐庵生平的探索。其中，国贻堂《施氏家簿谱》，尤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家谱是封建宗法社会的产物。为了明血统、序昭穆，维护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封建制度，作为宗族历史的家谱，在旧中国历来受到极大的重视，无论在编纂、刻印、承领、度藏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正因为如此，家谱在历史学家手中，往往成为研究历史人物的宝贵史料。对于研究象施耐庵这样在正史上失载的伟大作家的生平家世，家谱就具有更为特殊的价值。我们知道，最早看到以施耐庵为始祖的《施氏家谱》并引起重视的是胡瑞亭，他在发表于1928年11月8日《新闻报》的《施耐庵世籍考》中说：“今秋，瑞亭因奉公调查户口，迤邐长途，按户编籍，至兴化白驹镇有施家桥者，见其宗祠中所供一世祖，讳耐庵，心窃疑之。询其族裔，乃悉即著《水浒传》之施耐庵。更遍观族谱，得《耐庵小史》暨残零之墓志，爰录其崖略，供爱慕施耐庵先生者作为考证焉。”1943年，兴化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蔡公杰在施家桥施耐庵墓前建坊立碑，此碑至今仍在，字迹尚依稀可辨。碑阴文曰：“邑之东北隅有施家桥者，施氏之故庐也。考施氏族谱所载，先生避张士诚之征而隐于此。”台湾《大华

晚报》1981年7月26日发表《施耐庵故里及遗迹》一文，作者赵知人云：“笔者在抗战胜利后，从政于苏北地区，一个偶然的机会，经过施公故里，乃遍访遗老，探索其轶闻，并寻遍其遗迹，作成笔记；今于存篋中得之，作斯文，以飨读者。”文中有“据施氏族谱载：‘吾族始祖耐庵公，明初自苏迁兴’”之句。可惜的是，胡瑞亭、蔡公杰、赵知人等见过的这些族谱，未能保存下来。1952年，苏北文联派丁正华、苏从麟同志去兴化、大丰调查，写成《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一文，发表于《文艺报》同年第二十一号。《调查报告》说：

施氏家谱系清咸丰四年所修，无刻本。白驹镇西北二里港施氏后裔施莲塘（已死）家曾藏有手抄本，连年战争中已散失无存。我们调查所得者为施氏十八世孙施熙（字重光，住大丰县白驹区双龙乡义合村，现年六十八岁，原为地主成分）及施氏二十世孙施洋珠（住兴化县老圩区施家桥，现在三十余岁，当地民办小学校长）根据施莲塘藏本所抄之摘录本。两人所录大体相同。

这就是说，1952年调查所得，既非咸丰四年所修之原本，也非施莲塘所藏之抄本，而是后人据抄本转抄之“摘录本”，这就难免引起某些研究者的怀疑，甚至出现了所谓“伪撰家谱”的武断结论。

国贻堂《施氏家簿谱》的公诸于世，为解决疑团提供了信实的证据。这份家谱为施氏十八世释裔满家于1918年手录，是现存可见的关于施耐庵家世的最早史料。尤为可贵的是：家谱中载有第十四世孙施封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所

作的《施氏长门谱序》，对家谱从“纂修增订”、“被禄销亡”到再度编辑的过程讲得十分清楚。清咸丰四年（1854），这份家谱又考订了一次，陈广德所撰《施氏族谱序》云：“振远，武庠，有英声。其尊人峻峰（岑），勤勤于谱事，宝藏支谱于家。”到了民国七年（1918）满家抄录家谱时，已续至第十七世，并在施真全名下注云：“生恒远、僧满家”。这样，自一世始祖施耐庵到十八世，世系分明，长门（即文昱）一支，绵延不断。

这一世系表，是施氏一族世系源流的真实记录。现根据有关史料、文物，分别考索如下：

一世：始祖彦瑞，字耐庵。家谱载：“元朝辛未科进士。”据王道生《施耐庵墓志》：“生于元贞丙申岁（1296），为至顺辛未（1331）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恨以终。……盖公歿于明洪武庚戌岁（1370），享年七十有五”。

二世：让，字以谦。家谱载杨新于景泰四年（1453）所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公生于洪武癸丑（1373），没于永乐辛丑（1421）”，据兴化县1962年发现之施让地券，立券时间亦为景泰四年。

三世：文昱，字景胧，又字述元。王道生《施耐庵墓志》云：“去岁其后述元（文昱之字）迁其祖墓而葬于兴化之大营焉，距白驹镇可十八里，因之余得与流连四日。问其家世，讳不肯道；问其志，则又唏嘘叹惋；问其祖，与罗贯中所述略同。”

四世：无记载。据1978年秋兴化县施家桥出土之《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云：“彦瑞……生祖□□以谦，生父□□……”“生父”后一字不清，唯上端之“曰”字头清晰可辨，显然为一“景”字，查家谱，三世均以景字行。廷佐长门谱不载，但系第四世无疑，然为“景×”之子尚难确定。墓志铭载其卒于弘治岁乙丑（1505）。

五世：无其他记载。

六世：无其他记载。

七世：无其他记载。

八世：古泉。家谱载：“明朝邑庠生”。

九世：奉桥。家谱载：“明朝邑庠生”。据大丰白驹王显庆所献出土之施奉桥地券云：“卒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又兴化县新垛公社施耐庵墓地所在，地名曰施家桥，俗称“施家三桥”，为奉桥（转音为枫桥）、柳桥、板桥三桥之合称。查家谱，第九世即有奉桥、隆桥、石桥、板桥、柳桥五房，盖施氏长门由一脉单传一分为五之繁衍昌盛的开端，后世即以其祖先名为桥名，以为纪念，相沿至今。

十世：诒明。家谱载：“明乡饮大宾”。

十一世：雷夏。家谱载：“清廪膳生”；甘涛。家谱载：“清文庠生”。施封《施氏长门谱序》云：“谱系……自明迄清，相延不坠。继以雷夏、甘涛二公纂修增订”，可知雷夏、甘涛一世，确已进入清代。

十二世：康侯。施封《序》云：“雷夏公没，谱传康侯。”建侯。据陈广德《施氏族谱序》云：“并闻康熙朝有名建侯者，颇精于棋，从海陵缪侍郎湘芷游。”可知建侯乃

康熙朝（1662—1722）人。

十三世：圣言。施封《序》云：“康侯传圣言。奈何遭家不造，圣言被禄而因销亡。”虎文。家谱载：“生封”。文灿。家谱载：“恩赐迪功郎”，“生圭、坚、尧、均、垚。”据施岑《建祠记述》云：“其祠由国朝乾隆戊申（1788）先君文灿公与族伯美如公尽族祖奠邦公宅所改建者也。”按十三世有美如，系出石桥之后；十二世有奠邦，为二仪之三子。

十四世：三祝，讳封。家谱载：“恩赐迪功郎”，即乾隆四十二年（1777）撰《施氏长门谱序》之施封，家谱云“生銮、金。”峻峰，讳垚，家谱载：“国学生”。施垚咸丰五年（1855）撰《建祠记述》，文中云：“吾族始祖耐庵公，明初自苏迁兴，后徙居白驹场。由一本而分支派别，传衍至今，五百余年矣。”

十五世：金，字贡南，三祝次子。永昌，九章长子。永茂，禹珍子。铎，峻峰（垚）子。施垚《建祠记述》云：“道光丙申（1836），垚目击心伤，会同堂侄金（按：垚与金之父封俱为符经之孙），族侄永昌、永茂（按：永昌、永茂俱为石桥之后，与垚已出五服）欲踵其事。……无如人心不一，延至咸丰壬子（1852）……垚独首先倡捐，任劳任怨，引为己责，族侄永昌、男铎共襄其事……至乙卯（1855）四载经营粗就，罗列各房木主，定为春秋礼典。”又据二十世裔施宝国手抄稿，民国二十六年（1937）施忠文抄自施氏宗祠木榜文云：“后建立祠堂，十五世祖永茂、如同□经建完时，族公论举茂公子占鳌公写庵公迁籍遗迹，从道光二十四

年（1844）写到咸丰二年（1852）。”时间亦与《建祠记述》合。占魁，生树生。

十六世：树生，生真全、万全。

十七世：真全，生恒远、僧满家。

十八世：僧满家，生于光绪十五年（1889），民国七年（1918）手录《施氏家簿谱》于丁溪丈室。恒远，生施俊杰（82年六十三岁），乃满家之亲侄，即《施氏家簿谱》的珍藏者。他说：“当年满家叔叔抄这份家谱不容易，掌管家谱的长房不让抄，请了几桌酒才抄到。叔叔出家，没有后代，他把家谱交给我父亲恒远，要他传给我，千万不能遗失。”

综上所述，《施氏家簿谱》确实称得上是源流清楚，世系分明，且有多种来自不同时、地的文物史料（包括最近出土的地下文物）可以相互参证，因此，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史料。所谓“伪撰家谱”的臆断，是毫无根据的。“伪撰”说之失误，首先在于他们不明白，专记本族本姓世系源流的家谱，是绝对不可能容忍将一个伪造的人物当作“始祖”的。陈广德《施氏族谱序》云：“吾兴氏族，苏迁为多。”至今兴化、淮安、淮阴一带，仍有许多人传说其祖先从苏州迁来，可见元末明初确有因战乱而造成的自江南到苏北的大迁徙。施耐庵为避祸，迁往兴化，并非孤立偶然之事。他迁来兴化后，“由一本而支分派别”，成为施氏自苏迁兴之始祖，完全合乎事实。“伪撰”说之失误，还在于他们不明白，《水浒》在封建时代向被统治阶级视为“海盗”的坏书，写《水浒》并不是什么可以“光耀门楣”的事。据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介绍，由于曹雪芹写了《红楼梦》，